

女学 热点

发挥女性独特作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编者按·

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中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人口结构变化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女性作为生育决策主体、老年照料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与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在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中有着独特作用。本文作者认为,应在社会政策与制度设计中引入性别视角,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在养老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中重视女性需求与作用;保障女性发展权益,挖掘性别红利,释放人力资源潜力。

■ 宋月萍

人口老龄化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转型的挑战,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中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人口结构变化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三大战略任务围绕“一老一小”两大人群展开:提升生育水平,改善养老服务。女性是生育决策主体,是老年照料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也是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因此,重视发挥女性的独特作用是成功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的关键,在社会政策与制度设计中引入性别视角,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切入点。

构建以女性友好为基础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的之一是提振生育水平,减缓老龄化进程。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存在普遍的生育顾虑。一方面,育龄女性往往面临生育与就业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中显性或隐性就业性别歧视,这一矛盾深刻影响了女性的生育决策,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女性也是家庭无偿照料劳动的主要提供者,这意味着相比男性,大部分女性会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用于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从而直接导致女性就业参与机会减少、职业发展潜力受限等系统性困境,导致性别收入不平等加剧,这一现象也被称为“母职惩罚”。优化生育政策,不仅需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更需要从女性的根本利益出发,构建以女性友好为基础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只有在宏观政策设计中引入性别视角,调节女性生育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帮助女性摆脱“母职惩罚”困境,才能将生育友好落到实处。推行以女性友好为基础的生育友好政策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维护我国人口安全与社会稳定十分必要,一方面有助于减轻家庭生育负担,激励生育意愿,

促进人口年龄结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保障女性权益,改善性别不平等状况。

在养老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中重视女性作用

随着家庭规模核心化,家庭承担的养老功能趋于弱化,当前老年人群的照护需求日渐迫切。据估算,“十四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突破3亿,其中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失能与半失能老人的规模将快速增加,老年人的照护需求也将迅速膨胀。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实现“老有所养”,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迫在眉睫的任务。当下,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从供需两侧双管齐下,在发展养老服务过程中,更需充分认识到女性在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特殊作用和需求。在养老服务供给方面,研究表明,无论是养老机构中提供老年护理的工作人员,还是家庭护工,女性均占较大比例。但养老照料服务的种种特性,诸如老年护工提供的照料服务价值易被低估、服务费用支付大部分依赖于女或社会公共部门的经济支持、养老照料服务为传统女性聚集行业,收入易受性别结构影响、养老照料服务有效需求不足等,导致老年护工目前面临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缺乏保障的发展困境,限制了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在养老服务需求方面,女性老年人较男性而言存在更大缺口。原因有三:其一,老年女性在总量上多于老年男性,且女性高龄化趋势显著高于男性,但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却弱于男性;其二,由于女性往往倾向于与年长之男性结婚,且其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因此老年男性更多从配偶处获得照料,老年女性则更多从子女处获得照料。(但随着农村留守老人与城市空巢老人的规模逐渐增加,由子女承担的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不再稳定,老年女性的照料缺口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其三,老年人群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性别差异,老年女性的社会经济

地位往往弱于老年男性,养老金收入也低于老年男性,这限制了老年女性获得市场化照料服务的能力。在当下家庭养老功能退化、社区基本养老照料服务仍需健全的环境下,老年女性面临着极大的照料困境。

养老服务体系建事关老年人晚年的生命质量,是老年人最基础也最迫切的需求。在布局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方面,应引入性别视角,充分重视女性在老年照料服务需求侧与供给侧中的作用和需要。在供给侧,应根据老年护工的结构特点,以女性为重点,引入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加强对养老服务行业的投入与管理,可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提高老年护工的收入,同时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推动老年照料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等方式,为老年护工提供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改善老年护工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在需求侧,应重点关注老年女性面临的照料困境,缩小其照料缺口: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提倡各地因地制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拓宽农村养老照料服务对象的界限,帮助更多农村老人,尤其是老年女性享受到农村养老机构的照料服务;完善针对老年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老年女性群体的经济收入,保障老年人群的健康福利。

激发性别红利,释放人力资源潜力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积极挖掘人力资源存量,开发新一轮红利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点之一。然而矛盾在于,一方面社会普遍认为劳动力供给日益萎缩,需要鼓励生育,同时开发新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女性却因人口再生产而在职场上受到种种歧视,导致大量现存的优质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障女性利益,重视女性作用,推动性别平等不仅有助于促进女性的劳动力参与,更有利于激发男性的劳动潜力,催生性别红利。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甚至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女性有超越男性的趋势,但这仍然无法扭转女性在职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根据2020年底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自2015年来,普通本科在校女生比重5年来一直高于男生,而研究生在校女生比重也与男生呈现平分趋势。但女性的就业率仍然与高等教育获得的比重不相匹配,女性劳动参与率仍低于男性,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仍是存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种种性别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大量优质的女性人力资源被浪费。面对人口转变与老龄化社会提出的转型要求,应将性别平等与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性因素有机结合,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优化与制度改革,消除社会规范以及劳动力市场逻辑对女性的限制,突出女性与男性都是社会的参与者与建设者,都是社会的必要主体,对社会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构建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女性社会参与,催生性别红利。

释放性红利不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更能产生广泛的复合社会效应,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经济效益方面,若女性人力资源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劳动力短缺将得到缓解,女性优质人力资源也将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推动性别平等能够在2025年为中国带来2.6万亿美元GDP增长机会。在复合社会效应方面,通过将性别视角引入社会结构优化与政策设计,有助于保障女性权益,促进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推动就业率与生育率的同步提升,从而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功实施,实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阶段性成果。

把时间凝固在空间里: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的绘画

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的绘画

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佛兰芒画家安东尼·凡·戴克青年时代的一个笔记本中,绘有一位年迈女士的速写,四周以潦草的笔记记载着:“画家索福尼斯巴的画像,1624年7月于巴勒莫写生。她已经96岁高龄,记忆和各个感官仍在且‘极其敏捷。’”那一年,凡·戴克25岁,已是一位在欧洲宫廷中颇有名气的艺术家,他是慕名前往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约1532—1625)家中拜访的,可见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女艺术家在当时的声名与地位。然而随着不久后安圭索拉告别人世,她的艺术也渐渐被历史忽略甚至遮蔽了。好在艺术评论家乔治·瓦萨里于1566年在安圭索拉父亲家中看到了她的作品,并将她收进了他的《最杰出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他在书中指出,安圭索拉“在设计问题上比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位女性都以更深入的研究和更优雅的方式工作,因为她不仅学会了从大自然中提取和描摹,以及最巧妙地模仿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而且还自己创作了一些不可多得极其美丽的画作。”

作为最早为人所知,也是最早建立国际声誉的女艺术家之一,安圭索拉与同时代其他女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父亲是贵族而非画家。这位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小贵族生有六女一子,他没有条件为女儿



《棋局》,1555年

们置办丰厚的嫁妆,但却倾其所能为女儿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作为长女,安圭索拉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14岁时和妹妹埃莲娜一起被送到当地著名画家贝纳迪诺·坎皮的家中寄宿,3年后坎皮从克雷莫纳迁往米兰,安圭索拉又继续跟随贝

纳迪诺·加蒂学习。这一阶段,她通过两位老师接触到柯勒乔的新风格,并在父亲的帮助下得到了米开朗基罗的素描,通过临摹与反馈接受大师的指教。据说她那幅《被小龙虾咬伤的孩子》就是按照米开朗基罗对于哭泣表情的具体要求所作。后来她

赴罗马学习解剖学时,有幸当面拜访大师,并受到了他的关照与鼓励。

在父权制时代,女艺术家不可能得到教会的委托项目,因此没有机会创作宗教和历史题材的鸿篇巨制。于是安圭索拉投入肖像画创作的同时,又开创了一种表现生活场景的集体肖像画,后来人们称之为风俗画,因此艺术史上有时也称她为风俗画家。作于1555年的《棋局》就是一幅描绘她3个妹妹日常游戏的集体画像。她的妹妹露西娅和密涅瓦正在对弈,露西娅手执棋盘上权力最大的棋子“王后”微笑着望向画外,似乎已胜券在握;密涅瓦举起右手,神情专注地望着对面的露西亚;观棋的小妹妹欧罗巴则一脸心无城府的笑容,看向略显严肃的密涅瓦;而画面右侧的女家庭教师紧盯棋盘,似乎还在思考着战略战术。细腻的表情传达出每个人的个性,优雅得体的装束表明了姐妹们的高贵身份,画中人物的亲密互动烘托出生动有趣的家庭氛围。同时,安圭索拉借国际象棋这种益智游戏,还表达了另一层意思——女人也可以成为战略上的王者。

由于社交圈子的局限,安圭索拉早期作品描绘的多为自己和亲人的日常生活,例如她在自画像中表现自己读书、弹琴或绘画时的样子,这既是她平日真实的生活状态,也流露出对其高贵教养的强调。安

圭索拉深谙成功之道,她曾绘制过一幅《正在画索福尼斯巴的贝纳迪诺·坎皮》,利用画中国画的形式将老师和自己置于同一画面;在画中,她是老师的模特;在画外,老师是她的模特。安圭索拉以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强调了画与被画、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诙谐风趣的双重设计彰显了她超凡的智慧。

安圭索拉这种新颖的肖像画风格引起了阿尔巴公爵的兴趣,他不但自己向她订制肖像,还将这位女画家引荐到了西班牙宫廷。1559年,27岁的安圭索拉到了西班牙,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绘画技术,很快赢得了腓力二世和他第三任妻子伊丽莎·德·瓦卢瓦的欣赏和信任,但作为女人,她无法享有正式的宫廷画师头衔,只能以宫廷女仕臣的身份留在宫中。其间,她为皇室成员创作了大量肖像画,但与其早期作品相比,这些受限于政治需要和皇室固有品位的宫廷绘画,却失去了以往生动活泼、俏皮戏谑的独特品质。而这部分宫廷绘画也很少存世,大多毁于17世纪的一场宫廷火灾。

作为一位画家,安圭索拉以艺术风格上的妥协换得了一世安稳;作为家中长女,她以自己的“政治经营”实现了家族的富庶。她不仅以一技之长在男性主导的时代安身立命,还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将时间凝固在了空间之中。

学人关注

建构父职:开启“三孩政策”的新思路

·阅读提示·

“三孩”政策的落地催生了新一轮家庭与性别研究热潮。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向贤教授所著《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建构》中的有关思考,为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提供了新的启发。该书一方面为人们全面了解欧美国家的父职研究及具体实践提供了横向参照,另一方面为学界探讨当代中国父职的历史演变勾勒了纵向脉络,同时在纵横交错中对未来的父职建构提供了学理支撑。

■ 畅引婷

“三孩”政策的落地,催生了新一轮家庭与性别研究热潮。统观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讨论,大多将问题聚焦于国家如何为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提供条件。对于男性在人口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则多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比照讨论。而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向贤教授所著《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建构》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中的有关思考,或可为生育政策的完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提供新的思路。该书一方面为人们全面了解欧美国家的父职研究及具体实践提供了横向参照,另一方面为学界探讨当代中国父职的历史演变勾勒了纵向脉络,同时在纵横交错中对未来的父职建构提供了学理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和社会实践意义。

确立父职研究的独立范畴

人类社会自家庭诞生之日起,父亲作为男性的一种基本身份,在社会发展中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将父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探讨父亲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或功能,则是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和妇女运动的产物。在西方,父职研究早已成为民间运动、政府决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该书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一方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有关父职的论述进行系统梳理,将代表自由主义路线的美国与代表社会民主路线的瑞典相对比,说明父职建构的不同思路或理念对父亲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将问题聚焦于现实社会,从关爱父职、缺席父职、两孩政策、非婚生育、生育观的变革、父母身份建构的困境、家务劳动女性化、男性结

扎(欧美经验)、男性气质与性别暴力等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大量实证数据说明父职建构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该书认为,父职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意义的父亲实践,主要是指男性在做父亲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权利、义务及现实需求等。而父亲身份作为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和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如何成为男性的自我认同,并在儿童成长、家庭建设、社会再生产、公民权、社会团结和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作用,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将父职研究置于个人与家庭之外更加广阔的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是今后国内父职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同时,父职(包括母职)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生活的重要枢纽,在生育政策的制定中占有重要地位。

凸显父职建构的中国文化特点

父职不只是一个分析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形成过程。不同历史主体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主动建构或被动顺应,是父职文化形成的显著特点。该书认为,儒家通过典籍、律法、旌表、家训等途径对成年子女向父亲行孝的繁复建构,为当代中国父职及其建构奠定了大量显见和不显见的观念。这既是当今研究转型时期父亲责权变化的起点或土壤,也是理解转型期家长父亲权利/权力涨落的基础。国共两党20世纪20、30年代出台的几部劳动法中“重母职轻父职”的社会实践,一方面承接了清末维新派大力倡导的“强国保种”思潮,另一方面与调节、整合现代女国民“生育”与“生利”的双重劳动密切相关。因

此,1930年代国共两党在现代工业国家建设中所制定的劳动保护政策,尽管更多偏向对母亲的保护,但也内隐着父职从儒家范式向现代范式的转变,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调节妇女双重负担的框架,通过一系列妇女保护条例或规定,继续制度性地再生着职业妇女的母职。如带薪生育假、幼托服务、禁忌劳动和雇主责任制等妇女劳动保护规定,通过工种和技术等方面的性别再分配,构建了母亲以无酬的日常照顾为主、父亲以有酬的赚钱抚养为主这一适应大工业生产的育儿分工制度。换句话说,父亲拥有比母亲赚钱更多的能力(而非日常照顾能力),被制度化衡量为衡量好父亲的重要标准。这种父职和母职在建构中的二元互补和二元对立情形,既是现代性的后果,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四期保护”措施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力配置状况,市场经济对利润最大化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追求,不仅使女性“四期保护”的政策落实变得艰难,而且在政策法律上对母性机能的保护,还会导致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更加边缘。因此,如何在平等公正的政治诉求下,改变男女两性的传统角色,要求社会各界为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养育儿童的就业者提供保育服务,就成了父职建构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男性育儿假作为男性的一种基本权利,为父职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揭示父职建构的社会实践意义

将父职作为一个范畴进行专门研究,不只是

在学理层面探讨父职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该书不是单纯地就父职谈父职,也不是简单地将父职和母职机械类比,而是将二者置于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整体考察,说明父职和母职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互动与构构的。比如,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制定的中国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把妇女参加公共劳动与育儿公共化相结合,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女性在生育期间对父权制家庭和男性的依赖,促进了女性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但对父职的建构而言,这种制度性的支持,客观上忽视了男性在女性怀孕、分娩和哺乳期间可照顾女性、胎儿和新生儿的权利和责任;同时,用人单位单独向女性提供幼托服务的举措又进一步强化了生育责任的女性化,甚至将只能由女性完成的孕育、分娩和哺乳的“生”的责任,延长为只应该由女性完成的、持续多年的“育”的任务。因此,产假和育儿假这一福利政策不应只是女性的专利,同时也是父亲为增进与孩子的情感交流而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社会变革的层面讲,需转变的不仅是中国妇女劳动保护本身的逻辑,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性别分工、父职标准及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总之,为父之“道”究竟应该如何建构,该书提供了诸多不同于传统的思路与方法。将私领域的个人困扰与社会公共议题综合讨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看待问题的视野和社会实践的广度,而且对当今生育政策的完善和生育率的提升颇具启示。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